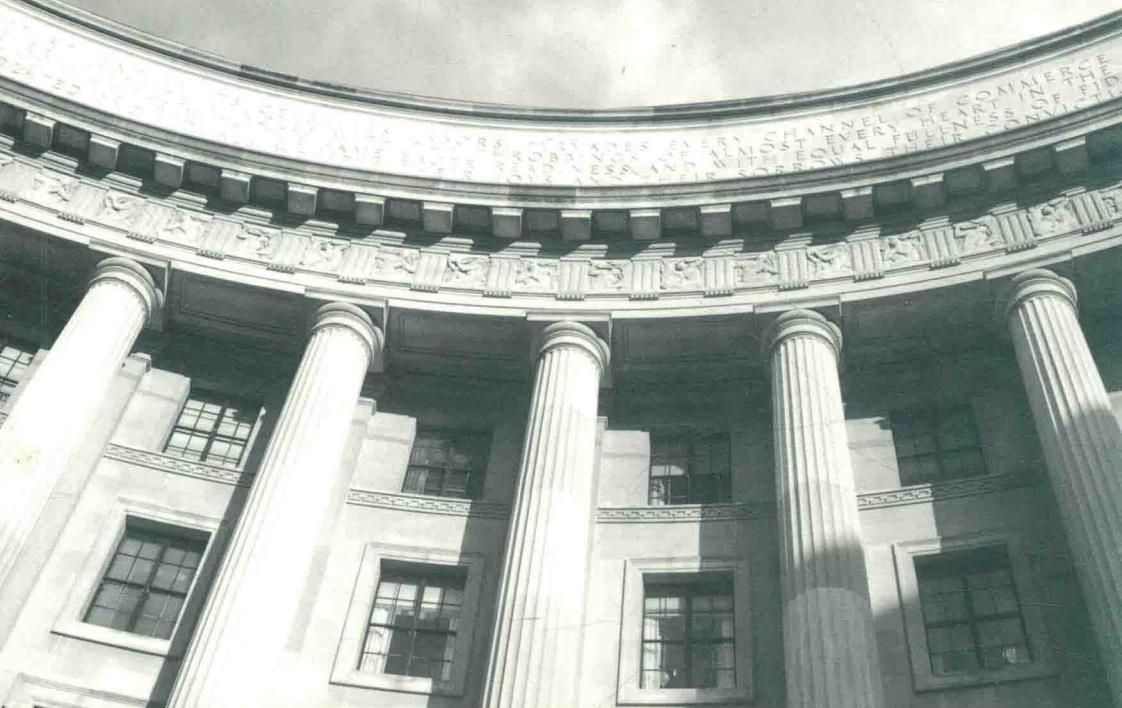




外交学院规划教材

刑法分析与适用

焦 阳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外交学院规划教材

刑法分析与适用

焦 阳 ◎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法分析与适用 / 焦阳著 .—北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18.1

ISBN 978-7-5093-8934-8

I . ①刑… II . ①焦… III . ①刑法—研究 IV . ① D91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268 号

策划编辑 / 责任编辑：孙璐璐 (cindysun321@126.com)

封面设计：杨泽江

刑法分析与适用

XINGFA FENXI YU SHIYONG

著者 / 焦阳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张 / 17 字数 / 269 千

版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8934-8

定价：60.00 元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38703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前　言

司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要防止司法适用中的恣意、偏见。司法官要做到判决的理性，首先要精通司法技术，保持法治精神，减少不适当的案外因素干扰。刑法的分析与适用正是一套专业化的技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着技术“屏障”。

《刑法分析与适用》一书立足于我国当下刑法学研究和实务热点，采用分章的专题式分析方法，全面呈现刑法的分析适用过程。全书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实践性，主要面向法学本科学生，也适宜广大刑法学研习者、实务工作人员、刑法学爱好者阅读。

本书受“外交学院本科教材建设项目”资助，为外交学院规划教材，供刑事法案例研习课程选用，也可供刑法总论、刑法分论课程学习参考。

相比其他刑法学教材，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容简明，论述重点集中。鉴于课程教学课时所限，本书所选择探讨的问题并非刑法理论中的所有问题，而只是具有争议性、疑难性的问题。这使得本书论述内容集中，纯介绍性的内容不在本书涵盖范围之列。此外，各部分论述突出简明特点，抛弃重复内容，便于读者阅读。

2. 学术观点具有综合性，博采众长。本书不就刑法学界的争论“选边站队”，而是尽可能呈现各种学术观点，在分析比较后得出每部分的结论。本书重点在于引导形成一种刑法学的思考理念和方式，更关注论证过程，对结论持开放态度。

3. 理论联系实际，尽量用生动的案例展现各问题争议，并展开分析。本书在各部分的论述中，大多按照先介绍理论，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尤其注重展示不同学说分析下的不同观点，为观点评析提供了前提。案

例内容切合实务，促进了刑法的实际适用。

由于本书写作匆忙，作者认识有限，有不少内容思考尚存在不成熟不到位之处，恳请读者们批评指正。诚挚欢迎广大读者向邮箱 jy0111_0@163.com 提供宝贵意见建议。

焦阳

2017年10月1日于北京西城

目 录

第一章 刑法分析理念与刑法解释	(001)
第一节 刑法学思考的理念基点	(002)
一、刑法诞生的启示	(002)
二、犯罪与刑罚的定位	(004)
三、刑法适用的谨慎性	(005)
四、刑法学分析与思考的特点	(009)
第二节 刑法教义学概述	(011)
一、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简史	(012)
二、刑法教义学的特征	(013)
三、刑法教义学与刑法的其他研究的关系	(015)
第三节 刑法解释基础	(018)
一、刑法解释方法概述	(018)
二、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	(021)
三、形式逻辑在解释中的全面贯彻	(023)
第四节 近年来刑法学领域的主要论争	(031)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031)
二、刑法解释与刑事政策	(042)

第二章 犯罪论体系及主要争论	(054)
第一节 大陆法系和我国的犯罪论体系	(054)
一、犯罪论体系的发展概述.....	(054)
二、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	(060)
三、探寻犯罪论体系共通的分析方法	(063)
第二节 英美法系的犯罪判断	(065)
第三节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要争论	(068)
一、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概述	(068)
二、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要争点	(069)
三、两种争论的举例分析	(071)
第三章 犯罪客观层面的认定	(074)
第一节 不作为	(074)
一、不作为的概念与构成	(074)
二、不作为的义务来源	(075)
三、不作为的判断	(077)
第二节 归责中的思维方式	(079)
一、条件说及其例外	(080)
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081)
三、客观归责理论	(083)
四、典型案例分析	(085)
第四章 犯罪主观层面的认定	(092)
第一节 犯罪故意	(092)
一、犯罪故意的类型及区别	(092)
二、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界分	(095)
三、犯罪故意的认定方法	(098)

第二节 犯罪过失	(101)
一、犯罪过失理论介绍	(102)
二、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109)
第三节 主观认识错误	(112)
一、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	(112)
二、对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	(118)
三、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的不同定位	(120)
第五章 正当化行为的疑难问题	(123)
一、正当化行为概述	(123)
二、正当化行为在判断中的疑难争点	(125)
三、偶然防卫的立场问题	(136)
第六章 犯罪修正形态的争议问题	(140)
第一节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争议问题	(140)
一、对着手的判断	(141)
二、对意志以外的判断	(144)
三、中止的自动性	(146)
四、共同犯罪中的停止形态	(150)
第二节 共同犯罪形态的争议问题	(155)
一、正犯与共犯区分的一般理论	(155)
二、不作为的正犯与共犯之区分	(158)
三、正犯与共犯关系的本质	(160)
四、共犯与身份的问题	(165)
第三节 犯罪竞合论的争议问题	(169)
一、想象竞合犯的概念及处理原则	(171)
二、法条竞合的概念及处理原则	(171)
三、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	(172)

第七章 死刑案件的裁量	(174)
一、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	(175)
二、死刑裁量中的情节分析	(177)
三、死缓的限制减刑	(178)
第八章 刑法分论中的热点问题	(186)
第一节 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别	(186)
一、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概述	(186)
二、常见罪名定性举例	(188)
三、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分析	(192)
第二节 对政策性罪名的认定分析	(196)
一、农民王力军非法收购玉米案	(196)
二、天津气枪大妈案	(200)
第三节 对伪造货币罪的解释	(203)
一、何为伪造	(204)
二、何为货币	(205)
三、伪造货币罪的主观目的	(206)
四、伪造货币罪与相关犯罪的罪数关系	(207)
五、小结	(208)
第四节 自杀及其关联行为的刑法定性	(209)
一、自杀行为刑法定性的理论基础	(209)
二、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定性	(210)
第五节 侵犯财产罪的典型分析	(213)
一、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分	(213)
二、盗窃罪与诈骗罪	(218)
三、抢劫罪与绑架罪	(227)
四、从惠州于某水案看盗窃罪的分析	(231)

第六节 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界分	(247)
一、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247)
二、实务案例中的区分	(249)
第九章 犯罪学的思考方式对刑法学的影响	(258)
一、犯罪学看待犯罪的不同视角	(258)
二、犯罪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259)
三、犯罪学思维对刑法的主要影响	(260)
后 记	(263)

第一章 刑法分析理念与刑法解释

关于法律人是否有独特的思维，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法理问题。法律人是人，也是普通人，喜怒哀乐、理智与情感，这些都与常人无异，否则便不正常。这里要探讨的是，法律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与其他学科学人相比，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法，且其具有特殊性。

同样面对社会问题，政治学经常从政府、社会与公民的架构出发，探求权力来源、解决之道。社会治理的方式有很多，如人治、德治、道治、法治，政体的形式也千差万别。哪种治理方式更好，从历史来，从经验来，也从治理手段的比较中来得出。政治学从公共权力的视角研究政治生活，在这里，国家统治管理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纷繁的学说流派中，民主制似乎显得更好，但不必然，法治更只是国家所选择的治理手段之一。

经济学的范畴很广，其研究者多长于数学计算。经济学的假设建立在理性人和自利人之上，似乎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而且都极力追求效用最大化。这种假设是无差别的、模式化的，它并不考虑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意志是否自由的终极争论，而是犹如推公式一般解释分析行为，并得出结论。这种解释尽量追求客观，而较少考虑公正、自由这些法的价值命题。

社会学以观察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它不像法学那样优先设立价值目标，然后批判再建构行为，而是了解社会的多元，倾听被“遮蔽”的声音，从事实出发引领大众的认识。应然怎么样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发现真实，并用理论予以解释，这就够了。

法学拥有自身的特性，传统的研究多用规范式论述。立法论的思路是首先确定法律理念，以此为指导，分析评判现行立法，再提出修改完善建议；司

法论则吸纳传承了法教义学的研究思路，以规范分析为主要方法，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目的性的指引下，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得出结论。无论上述何种模式，法学论者以法治为最高、最优目标，认为良法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高追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应作为变量纳入法治轨道，寻求规范解决之路，法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问题，单纯的描述现实并不足够。

“法律是公正与善良的艺术”，这是理念层面的，对公法研习者而言，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人权利是现实共识，这使得公权力机关经常成为对抗的对象，这点便与政治学的思路不同；规范分析是一套技术，规范之间具有体系、层级关系，逻辑本身自洽，且法治追求的是理想、应然目标，这又与复杂的社会学现实有一定脱离；法学是研究制度与人的关系的学科，充满了价值判断，它无法做到经济学那样的冷静专一，而不得已掺杂着个人的“情感”。法学思维是一种具有“地方性”的思考，法系、国情、观念的不同，都能使得相互之间难以对话，这又使得法学思维具有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性。

法学方法与思维的上述不同使得法律人的思考与众不同，法学理论历史深厚、研究需要功底，法学问题复杂多变、面向时代，法律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体现出法学思考的难度，而这也使得法律人应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

本书探讨刑法的具体分析与适用问题，自然离不开刑法的思维。刑法的思维体现出刑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性，核心内容是对犯罪的分析以及罪刑关系。犯罪永远是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只不过刑法学坚持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犯罪，以此为基础，展开出一幅丰富多彩又充满逻辑，有序又温情的画卷。

第一节 刑法学思考的理念基点

一、刑法诞生的启示

刑法学这门学科对普通大众来说总带有神秘感。一方面，通过电视新闻、法治节目、新媒体舆论，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刑事案件，该类事件往往也最能吸引公众“眼球”；另一方面，刑法又最强烈、最严厉，似乎一触及刑法，这个人必定会被关入牢房，这一生也就完了。

作为专业人士的法律研修者，对于刑法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刑法能

够开启智慧、引领正义，刑法的底线彰显着一个国家的底线。学习刑法，就自然要怀着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而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得更顺畅，更有尊严。

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刑法总与统治者的意识密切相关。曾几何时，只要君王发怒，需要砍头，那对方就不得不死；在欧洲野蛮的中世纪，教法不分，宗教裁判的恣意荒唐更创设出无数残酷的刑罚执行方式。近代刑法正是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启蒙学者们痛斥封建的残暴，敢于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批判封建刑法的残酷性、随意性，建构起了以罪刑法定为核心，以罪刑关系为内容的古典刑法体系。

刑法的产生以保障普通人的自由为己任。国家垄断了刑罚权，这是为了使惩罚集中有效，让社会交往能够顺利进行；刑法的罪刑内容在国家与公民间签订了契约，划定了自由的边界，民众通过行为规范知道了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裁判者通过裁判规范知道了如何对触法行为进行处理，刑法就通过其作用的发挥明确了一个国家的底线。

从古典刑法体系到新古典主义，到目的主义，再到综合体系，直到当下的机能主义的刑法体系，不同体系的排列组合及指导思想在发生着变化，但罪刑法定这一核心仍没有变，犯罪仍然是主客观一致的认定过程。正因为此，刑法不同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起作用的方式，法律原则、习惯、公序良俗都不能直接成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对一个人的权利的剥夺必须依据刚性的程序，严守刑事法律，有可能成为犯罪人的权利在刑法中被格外看重。

我国刑法的产生也非一帆风顺。原始社会同态复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刑罚的残酷种类超出人的想象，刑法在那时就是皇帝与王朝的“家法”。之后西学东渐，刑法的变革向日本看齐。短暂的历史过后，“六法全书”被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艰难奋进中开创自己的法制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并没有一部刑法典。十年“文革”期间没有刑法依循，这惨痛的经验呼吁全社会制定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尽管从现在的眼光看，它存在颇多粗糙之处，但当时却凝聚了一代人的经验教训。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再到现在已通过的九个《刑法修正案》，我国的犯罪圈更加严密，刑法回应社会关切的效率不断提高；同时，各级司法

机关也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认识到刑法为其划定的边界，懂得即便是犯罪人，也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追诉其犯罪，而不能随意定案、主观定案。

明确了这些，专业人士就应当对刑法有崭新的认识。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面对脆弱的人性，国家不应当什么都拿去，刑法也不应当冲锋陷阵，时刻走向社会的“前台”。当一个社会的刑法守住防线，犯罪人数量不过度膨胀，社会治理方式多样呈现，才表明社会治理结构协调合理，走向“良法善治”才有希望。因此，研习刑法并深化刑法理论，不是为了消灭一切罪恶，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理性的犯罪观告诉我们，犯罪不可能被消灭。刑法的诞生发展建构在保护人这一基点之上，而这被保护的人既包括社会大众，也包括犯罪人，犯罪人同样是人。每个刑法的适用人员都应坚持如上的使命。

二、犯罪与刑罚的定位

相对于犯罪理论的抽象，刑罚更能给普通人直观印象，刑法作用的发挥也依赖刑罚的效果实现。罪刑关系，不是单向的有罪就有刑的关系，刑罚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刑法作用的发挥。由罪生刑、以刑制罪，罪刑关系的互动决定了刑法在社会上是否有效。关于刑罚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古典刑法学家们未给出一致的答案，康德和黑格尔通过不同的回答方式，都对刑罚做出了进行绝对理性的回答。康德认为刑罚只能作为对行为人之罪责的报应，并以人格尊严来佐证该观点。费尔巴哈作为康德学派的一分子，却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在他看来，法律中的刑罚威吓却包含一般预防之功效，能够防止潜在犯罪人实施犯罪。这种便是消极的一般预防。^①现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张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该理论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大众形成规范意识，自觉遵守法律而不犯罪。报应论与预防论的争论在刑罚目的领域延续了数百年，无论哪种刑罚目的都不是单一的，报应面向已然之罪，预防面向未然之罪，只有结合报应与预防的并合主义才符合刑罚的目的。

犯罪是一种恶，刑罚也不是一种好东西。刑罚是国家公权力“以恶制恶”

^① 参见[德]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的一种手段，动用刑罚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恶效果。选择用刑罚手段制裁犯罪，就要事先考虑好刑罚产生的恶能否接受，会否让社会承受更多消极结果。刑罚用得多了，公众容易认为刑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从而产生刑法依赖，一味围着公众呼声确定刑法的司法适用，则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也会使社会陷入报复的恶性循环。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可选择性在这种情况下会大幅度缩小，这样的社会也难以面对未来的竞争。“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①

犯罪学经验告诉我们，犯罪不可能被完全消灭，一个社会良性治理的标志是将犯罪控制在理性范围内。既然要控制犯罪，就有刑法的用武之地；既然不可能消灭犯罪，就不能将犯罪控制的重任完全寄托于刑法之功能。因此，刑法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刑法解决不了纷繁世界的所有纠纷，刑法不能压制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刑法这种必要的恶必须存在，但也需要控制。

三、刑法适用的谨慎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明确了刑法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罪刑规范的设定要以保障人为目标，选择适用刑法要尽可能谨慎。

（一）刑法的属性要求谨慎适用刑法

刑法具有谦抑性，这是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刑法的谦抑性具体表现在片段性、补充性、最后性上，即刑法保护的法益是不完整的，不是所有的法益都需要刑法保护；刑法保障其他部门法的实施，对民法、行政法的保护起补充作用；刑法在事后起作用，其手段的严厉性决定了其最后性。刑法的这种特性要求刑法的适用要尤其谨慎。

刑法的严肃性要求必须严格谨慎适用刑法，但刑法理论纷争却又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类刑法思潮交锋频繁，站在不同的立场，最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刑法中的学派之争掀起了大争论，促进了刑法体系完善，推动了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学派之争不是个人之争，理愈辩愈明，学派之争促进

^①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思考深化。

在刑法研习过程中，重要的问题不是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得到这个结论的论证思考方式；是什么样的论证立场使你推出了这样的结论，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在刑法适用过程中，要考虑维护的是什么法益，现有的判决能否与已有判决、刑事政策相协调。

近年来，各级司法机关曝光冤假错案的数量明显增加，理论与实务部门都在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除了典型的涉及死刑的冤假错案外，很多触动老百姓心灵、与公众认知相差悬殊的案件，如天津气枪大妈案、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刺死辱母案（于欢案）等，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也成为舆论场上的热点。这类案件，或多或少都与司法适用中理解、解释法律不当有关。这启示我们，解释方法、解释技巧的选用，既是专业技术问题，又事关每个被告人的命运，刑法适用不当、机械司法带来的弊端会损害整个刑法根基。

刑法的适用，关键不在于对书面上的每个语词如何解释，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怎样做到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融通。即便每个刑法用语都被解释得很完善，但其所坚守的理念是僵化的、错误的，则最终的结论也无法被信服。刑法的适用不是“空中楼阁”，刑法与社会的沟通需要融入常人思维，引入“常识主义刑法观”。^①现有刑法理论如何回归现实生活，回归中国国情，是刑法适用者必须努力的方向。对于刑法的谨慎适用，司法工作者应作为理念内化于心。

（二）如何看待刑法扩张的趋势

与理论设想不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民众期待刑法能有效抑制犯罪，做坏事的恶人能得到惩罚，刑法的严厉性特征被放大。于是，从德国、美国到中国，刑法的变革历史体现为犯罪扩张的历史。古典刑法的美好期待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存在，犯罪圈持续扩大，受惩罚的人越来越多，立法也成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手段。

刑法理论家的愿望与刑法实务的发展呈现出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这一情

^① 参见周光权：《常识主义刑法观》，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

况不仅在我国出现，而且遍布全世界。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社会的急剧变迁加速了刑法的需求。刑法本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体现出的是辅助性的法益机能。不是所有的法益都需要刑法保护，刑法也不能起到保护所有法益的作用。但是，现实社会日新月异，新媒体时代让人无处可藏，网络的发达让任何一个行为的影响都能溢出一国边界。“当下恐怕整个人类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随着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区块链技术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屏障，开始以我们从未想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普及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间”。^①这些都深刻影响到法律秩序。网络信息化行为、生物科技行为、电动驾驶技术、传媒舆论扩展、国际犯罪行为等，都需要刑法及时跟进，为其提供保障。即便是传统犯罪，借助了新的工具和形式，也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态。对刑法用语的解释就要超出立法时所想，与时俱进，做出与时代要求相称的解释。如对于“财产”的理解，就要包含虚拟财产在内，虚拟财产与传统的财产具有本质的相通性，刑法需要紧跟变化的社会，根据社会的需求这样的扩张也就符合实质正义。

其次，新传媒、新信息的极速传播变革了社会的“发声”方式。从犯罪发生到被害人、社会大众反馈，在以往时代，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现如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能够实现信息的同步传输，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发生的事件。于是，违法犯罪事件的传播效应被放大，严重极端的个案被大众传媒曝光，让普通民众产生社会治安很差，急需法律严厉打击的错觉。实际上，把这个案当普遍，迷信刑法的功用是当下信息传播的特点，这类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失真，从而引发的过度适用刑法的诉求催促着决策者，促成刑法的扩张。

再次，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影响力还不够强。犯罪学作为事实科学，关注的是各类犯罪现象的成因和发生规律，期望寻求犯罪治理对策。合适理性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属于犯罪治理对策之一，它原本应建立在充足的犯罪事实之上。从事实再到规范，这才能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但现实是，刑事科学

^① 王轶：《让我们一起成长——王轶院长在2017年法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网站 <http://www.law.ruc.edu.cn/article/?52992.html>，2017年9月17日访问。